

文史資料

第 二 期

(总第三十一 期)

政协仪陇县委员会学习文史法制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 六 月 十 日



征 求 意 见 稿

目 录

仪陇民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唐肇阳
马鞍场四十一年变化.....	唐超群
福临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反复辟的斗争.....	王朝兴
追忆茶房寺.....	何思义供稿 李蚊蛟整理

仪陇民盟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唐肇阳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成立已有五十多年了，仪陇民盟组织从建立到现在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回顾仪陇民盟组织的历史，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由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

一九四六年秋，中共党员、民盟盟员戴冠雄同志当时在南充工作，又名戴天德，仪陇县马鞍场人，其伯父戴与龄、父亲戴茂林是朱德同志好友）接受中共南充地方党组织、民盟南充市组织负责人贾子群同志的指示，回到仪陇，在县城和马鞍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发展了唐超群、许克恭、许正元、许明扬（朱德同志的外甥）等同志加入民盟。同时张幼房（四川大学教授，回县后任县参议长）、康济南（曾任川康绥靖公署少校参军，重庆江北防空地区指挥官兼新编二十八师留蓉办事处处长、第二旅副旅长等职）、唐子明（川大中文系毕业，回县后在仪陇中学任教）、蒋祐周（曾在成都市某中学任校长，回县后任仪陇县师范学校校长）、许强（西南美专毕业，回县后在仪陇中学任教）、王锡光、庞琼德等几位盟员，接受省民盟组织领导的指示，也先后回到仪陇县，组织爱国人士进行革命斗争，他们与戴冠雄、唐超群、许克恭、庞郁兰（戴冠雄爱人）等同志一起，从事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争和平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农村组织抗丁抗粮，抗苛捐杂税，反对地方封建恶霸势力。

一九四九年秋，他们组织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保护国家财产，维护地方秩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唐子明、许强等在县城团结和动员仪陇中学、南图中学（私立）和金城小学一批青年教师如：张定良、陆朝岳、戴秋芳、黄敦友、龚天觉、唐熙敏等，在教学之余，利用坐茶馆、打小牌、聚餐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许强等同志通过开办茶馆，结识了一批开明的中层人士和工商界人士，秘密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还组织进步学生排演话剧、办壁报、漫画专栏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同时联络仪陇籍在成、渝两地大学的同学创办了《仪渝观》小报，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行。9月康济南同志回到仪陇，积极进行军事联络和迎接解放的工作，由于他曾在川军任高级职务，因此仪陇县的上层人物和地方实力派都争相奉迎，康则遵照组织指示积极配合中共仪陇地方党组织活动，努力做仪陇县中上层人士的工作。是年冬，由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县内反动统治者，为抗拒解放，阴谋筹组“反共救国军”，请康济南负责组织筹划工作，康根据仪陇地方党组织指示，为了争取和利用这支队伍，趁机说服大恶霸地主、反动武装头目李觀光，将名称改为“冬防民警联合办事处”，由李觀光任主任，康济南任主任参谋，这支武装分五个大队，十四个小队，三十五个分队，一个特务班，官兵共一千七百多人，各种武器五百五十件，子弹一万一千多发。他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同时积极做仪陇县地方反动武装力量的分化瓦解工作，经多方努

力，基本上控制了仪陇县冬防民警这支队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一军解放了仪陇。当天下午戴冠雄等同志就赶到仪陇县城，中共仪陇地方党组织于二十四日召集戴冠雄、胡崇德、康济南、唐子明、刘业惠、张定良、罗春咏等各界爱国人士开会，成立了仪陇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选举委员十一人，下设宣传、支前、治安三个组，分别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收集粮草支援过境解放军和宣传《约法八章》等工作。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郭林祥，率部路过仪陇县城，听了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部分成员的工作汇报后，决定改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为解放委员会，以免与过去日本占领区的维持会相混淆，建议增补中共党员胡崇德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以加强对解放委员会工作的领导，决定留十五名解放军，作为解放委员会的防御力量。次日，县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县解放委员会并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向全县发出通告，宣布在县人民政府未成立前，全县一切权力归解放委员会。随即开展维持地方秩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安定人心和支援解放军等工作。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仪陇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郭宪书根据党的政策，安排原解放委员会李觀光、戴天德、胡崇德、康济南、唐子明等，分别负责县的工商、文教、民政、建设和县人民政府的秘书工作。

一九五〇年秋，民盟盟员登记，经民盟川北总支部审核后，认定唐子明、蒋祐周、许强、唐超群、许克恭、康济南、王锡光七位同志

为盟员（这时，戴冠雄、张幼房、庞琼德、庞郁兰、许明扬等同志已调外地工作），一九五一年二月民盟川北总支部派唐仲达同志来仪，与中共仪陇县委研究后，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仪陇县直属小组”，直接由川北民盟总支部（后改为“民盟南充市委员会”）领导，由唐子明同志任组长，许强同志任副组长。中共仪陇县委很关心民盟的工作，决定将没收的一幢公房（系原国民党仪陇县委书记长黄治的住宅楼）的一部分（二楼）划拨给民盟仪陇直属小组作办公用房。在门口挂上了民盟仪陇直属小组的吊牌，从此，民盟在仪陇建立了正式的组织。以后盟员王锡光调往重庆，许强调往岳池，姚林、唐笑来二同志调来仪陇中学，到一九五三年，民盟仪陇直属小组有盟员八人，副组长由唐笑来同志继任。

从解放初期到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之前，仪陇民盟组织的工作和活动都很活跃。每周星期六都坚持过组织生活，大家认真学习党和上级民盟组织的重要文件，畅谈大好形势，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交流工作经验和学习心得。当时县委书记周慎、县长郭宪书等领导同志多次到民盟仪陇县直属小组指导工作，县委统战部和仪陇中学党支部也多次派人来帮助开好组织生活会议。由于在组织生活会上坚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盟员的思想、工作和学习要求严，因此各盟员在各种政治运动和工作上表现都很好。如唐子明同志，后来调到仪陇中学担任语文教研组长，教学质量高，在师生中很受尊敬。许强同志利用画笔，解放初期在县城各醒目的地方绘制大幅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

为配合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还画了许多鲜明跃眼的大幅宣传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特别是一九五一年他创作的大型连环画《仪陇县大恶霸地主李觀光》，在全县城乡展出（后木刻成画册），宣传效果极好，获得中共川北区党委和川北行署的奖章和奖金。

解放后，中共仪陇县委对民主党派不仅在政治上时刻关怀和帮助，而且在工作上大胆信任如康济南同志一九五一年三月被选为仪陇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第二届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又被选为仪陇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主管工交、建设工作。唐子明、蒋祐周等同志都曾当选为县人大代表。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我县民盟盟员不少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错误的批判。从此，民盟组织处于瘫痪状态。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拨乱反正，平反了冤假错案，民盟组织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得到重新恢复和发展。一九七九年底，唐子明、蒋祐周二同志出席了民盟南充市委召开的盟员大会，会议要求盟员同志响应党的“团结起来向前看”的号召，尽快恢复组织，为四化建设出力。但由于当时人数太少（只剩下唐子明、蒋祐周、唐超群三人），加之痛定思痛，余悸犹存，组织一时无法恢复。一九八六年五月，蒋祐周同志因病逝世，全县盟员只剩下两人。这年十二月下旬，中共仪陇县委统战部召开县内部分知识分子座谈会，到会的有吴玉书、何其国、

朱诗俊、唐肇阳等同志，学习中共中央（1986）9号文件，宣传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宣讲民盟的光荣革命历史，并宣布民盟仪陇小组恢复活动，发展成员。一九八七年二月，发展了城关中学教师唐肇阳、进修校讲师郑明昌入盟，之后，又相继发展了吴玉书、何作霖、杨大钊、陈奇、程光鼎、李慰民、徐崇周、伍承焘等入盟，盟员发展到十二人，小组负责人是唐子明、唐肇阳二同志。一九八八年七月，经民盟南充市委员会批准，建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仪陇县支部筹备小组”，吴玉书同志任筹备组长，唐肇阳同志任副组长，唐子明同志为组员。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于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九日正式建立了民盟仪陇县支部委员会，由吴玉书任主任委员，唐肇阳任组织委员，唐子明任宣传委员。在成立大会上民盟南充市委副主委伍程遐宣布了批准书，县委副书记、县长李阶生（现任中共仪陇县委书记）和县委副书记张思智（现任仪陇县人大主任）二同志向支部授予公章和吊牌，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及县城部分单位的领导同志前来祝贺。戴冠雄、张崇古二同志也专程从南充赶到仪陇祝贺。支部成立后，认真开展盟务活动，积极参政议政，为振兴仪陇经济献智出力。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民盟仪陇支部紧跟党中央，坚决反对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为稳定仪陇地区局势努力工作，受到中共南充地委统战部和仪陇县委的肯定和表扬。近几年又先后发展了韩准甫、毛忠琼、李扬贤、顾恒一、杨继承、高正超、周天金、鲜明阶、唐维汉、张俊雄等入盟，盟员至九一年底已发展到二十二人。

为适应形势和工作需要，经过民主选举，增补韩准甫、唐子明二同志为支部副主任委员，郑明昌同志任宣传委员。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支部换届，由吴玉书、韩准甫、唐肇阳、张俊雄、杨继承组成第二届支部委员会。八九、九〇年，盟员程光鼎调德阳市工作，李扬贤调到广元市工作，杨大钊退休后于一九九一年一月到岳池定居。现有盟员十九人，其中在职的十五人，离退体的有四人。盟员中有中学特级教师一人、高级技术职称三人、中级技术职称的十一人，大都分布于仪陇中学、教师进修校、金城中学、卫校、教委、卫生局、县医院、县防疫站、文化馆、川剧团、南图中学、县政协、县科委、县图书馆等十四个单位。目前，全体盟员正以中共中央（1992）2号文件为指南，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为振兴仪陇经济献计出力。

回顾过去的历史，仪陇民盟组织及所属成员，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主动积极地争取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与之通力合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马鞍场四十年的变化

唐超群

我今年八十六岁了，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的时代，亲眼看到马鞍场八十多年的变迁，变化最大，进步最快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四十多年。每当我

拄着拐杖，走上街头时，就情不自禁的想起马鞍的过去和现在，相比之下，这变化的确是太大太大了。

还是孩童时，我就听老人们讲，马鞍场建于明朝（什么年代记不清了），因建场时这里是一片荒山野地，故命名“荒山场”。当时的荒山场位于今马鞍镇千坪村，现在人们把它叫老场沟。1646年7月，张献忠义军与清军在这一带混战，“荒山场”焚于战火。直到清康熙年间，由湖南、广东等省来川的移民，才又重建新场于马鞍山下，命名“马鞍场”。民国十五年（1926年），仪陇县民团在陶知事梦云的指挥下，肃清马鞍地区匪患后，改名为“永安场”，其再无匪患。1950年1月18日，仪陇县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正名为马鞍场。而今这里是区、镇所在地，已成为马鞍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马鞍镇位于仪陇县东南部，距县城36公里。它东邻柳垭（悦来）、铁山（高坡）乡，南连杨桥（骑龙）、石佛（旭日）乡，西依周河（双龙）乡，北靠福临和巴中县的群乐乡。东南长约7公里，南北宽有5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西北多山，北有三墩坡、三星寨、马鞍山（均源于大巴山脉），经章怀寺、八庙坪南下三墩坡，最高点海拔680米，西有风景秀丽的琳琅寨。且三星寨、琳琅寨的支脉纵横交错，逶迤向南。从南北到东西稍成倾斜状，形成中丘中谷地带。还有杨木寨障于东，董家梁、鹿子山、河泥寨屏于南，场镇四周皆山，其势略如盆，环抱着14个村，97个社，抚育着3460户，14194人。这里属深丘低山温凉气候，冬冷夏热，春秋温凉，年

平均温度为16.7℃，无霜期年平均为244天，降雨量集中，多秋雨，年平均为1200毫米。土壤 由于各地母质来源不同和地势部位的差异，可分为“紫色性水稻土”和“石灰性紫色土”两个亚类。全镇面积约8066亩，其中可耕地面积6610亩，宜种植稻麦和油料作物。

马鞍无大河，仅有小南海、丁家河、倒石桥三条小溪，缺乏水利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和政府 为解决农田水利灌溉，除补修旧平塘十多口外，又组织农民新修筑平塘、山弯塘、蓄水池等设施，以保农田灌溉，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修筑金山、琳琅、大垭三个大水库，又修河堰四处，平塘89口、山弯塘20口、蓄水池209个，各种水利设施总容水量达646.3万立方米，可灌溉9393亩农田，不仅解决了本镇农田用水，还可供给外乡、村部分农田灌溉，大大改变了马鞍地区历史上靠天吃饭的落后状况。

一九四九年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马鞍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产量仅五十万公斤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广大农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做了主人，而且在经济上也翻了身，人民政府根据人口的多少，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调动了人们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得到了解放，粮食总产量增加到九十万公斤，合作化时期产量上升为三百四十五万公斤。虽然在大跃进、办公共食堂、刮共产风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影响了农业生

产，粮食产量曾数度下降，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解放，农、林、牧、副、渔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连年上升，到1991年，全镇粮食总产量已达到591.61万公斤，比解放初期增长5.57倍，温饱已彻底解决。目前马鞍人民正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奋进。

马鞍镇的手工业和乡镇企事业，也是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民国时期只有酿造榨油、制蔗糖、造纸、染布等手工业作坊和部分手工业主经营的缫丝、铸造、纺纱、修房等手工业，其余为农村个体手工业者和各行工匠。民国后期，多因货币贬值而亏本倒闭。建国后，党和政府，组织各行工人，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地方企事业，现在马鞍镇的社办企业有：农机站、砖瓦厂、建筑队、汽车队等，县办企业有：能生产三号打米机、各式油罐等储油设备的农业机械修造二厂，从原料到面粉装包全部自动化的面粉加工厂。而今全镇照明用电、加工用电、灌溉用电都已得到解决。这是四十年代不敢想象的。

民国后期，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商业基本衰竭。建国后，政府着手恢复和发展商业，1952年供销合作社成立，加强了对商业的领导，并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使商业迅速发展。1956年对原工商业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所有的商户组织起来，归属为服务业、日杂百货业、药材等十二项目，统一管理、统一经营或分散经营，使其有计划的发展。到八十年代，

合作商业成立集体商业联合公司，分设24个门市部。供销合作社是人民集资办起来的，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虽大跃进中，违背管理制度，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供销合作社供销两旺，远远超过六十年代的发展速度，目前全镇已有各种门市部七十九个，年销售额为七十年代的1.7倍。还有棉花转运站、食品站、粮站、物资供应站、付食品批发站等县办商业单位提供工商业需要的物资和日常消费品。总之，建国四十多年来，朱德同志的故乡——马鞍山，商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市场繁荣，各业兴旺。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促进农、工、商各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解放前，这里的物资运进运出都是靠人力肩扛、背扛，解放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下，五十年代就修通省道仪（院）马（鞍）路、马（鞍）周（口）路，仪马路解决了我县西北和东南历来道路阻隔的困难，马周路解决了县东南物资输出和输入的困难。目前全县乡乡通公路，各乡与马鞍均有公路相连。由于交通的发展，运输工具的发展更是惊人，由解放初期用人力的挑背，到五十年代人力板车，进而今天的拖拉机、货运、客运汽车。目前，马鞍已成为县东南交通枢纽，客运班车日经马鞍九次，可直达南充，各种货运车辆拉进运出，络绎不绝。

邮电事业飞速发展。民国时期马鞍只有邮政代办处，办理信件和汇兑业务。1950年后才添短波电话机一部，办理通讯业务，到目

前为止，有百门交换机一台，三路载波机一台，能开通全国的长途电话，甚至能办理香港等地信件和邮件的转发工作。

马鞍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令人瞩目的。民国五年（1916年）在马鞍只建立了一所仪陇第二高等小学校，到民国二十七年才在各保设保国民学校，乡设中心完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教育，不仅马鞍场设完小一所，各村均有小学。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办学制度，鼓励群众办学，采取民办公助（国家补助）的办法，办起了民办小学。同时，在农村大办业余学校，进行扫盲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历年来对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教育质量大大提高。虽然在“十年浩劫”中教学秩序大乱，教师尊严被践踏，教学质量下降，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教育事业迅速恢复，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有公、民办小学30所50个班，在校学生2000多人，小学教育已实现普及，正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中学教育发展更快，1955年，马鞍中学建成，到1985年已开设初中七个班，高中十个班，共有在校学生1000多人，历年来为我国各大专院校输送了不少的人才，仅1985年升大学的就达55人，中专生19人。升学率名列全县第二名。

马鞍群众文化活动，在旧社会是很单调枯燥的，民国时期虽有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设施，但只限少数人阅读和参加棋类、兵乓球等活动，传统节日才有川戏、木偶等于会馆演唱，群众局限在一定的范

围内活动。解放后，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范围扩大了，内容丰富多彩。在六、七十年代，乡就设了广播站，家家安上了有线广播，新闻时事坐在家里就可收听。文化站有书报、川戏、各种文娱设备、电视、录像、歌舞等文化活动，图书馆有各类书刊46000多册，报纸30多种，影剧院每天最少一场电影，有时多达四场，基本上满足了群众精神上的需要，对搞好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建国四十多年来，马鞍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民国十七年只有民间中医十三人开业，天花、霍乱、麻疹、疟疾、伤寒等大的传染病流行乡里，根本无法医治，死亡率高达20%。建国后，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健康，重视医药卫生工作，制定了“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医卫工作方针，提倡“中西医结合”，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向工农兵“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五十年代，组织中面医生发动群众集资兴办“医药合作社”，对中西医生进行轮番培训，对群众注射各种防病疫苗，消灭了天花，到六十年代初就基本消灭了钩虫病、霍乱、伤寒等传染病。还建立了乡医院、区医院。有病床70多张，专业医护人员70多人，在各村还建有医疗站，并且全镇现有散在医生40多人。医疗、卫生设施和水平的提高，使人民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建国四十多年来，马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和提高，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

了历次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政策，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今马鞍人民决心发扬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奔向小康 作出更大贡献。

福临乡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反复辟的斗争

王 朝 兴

仪陇县福临乡与巴中县茶坝区群乐乡接壤，是仪陇东南方向的一个边远山区。一九三三年红军曾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革命活动，至今人们记忆犹新。

一九三三年八月，红军特务连便衣队20人由赵连长带领从巴中县茶坝区出发，经仪陇来仪乡进入福临乡宝瓶观（现保平村）和猫儿嘴（现插旗村）。进村后，他们召开贫雇农会议，宣传红军是为穷苦人民办事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二天特务连的红军又进入福临场，在街上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干革命的道理，并在街头的墙壁上，大路边的岩石上写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农民分田”等标语。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成立乡苏维埃，地址在福临场关帝庙（现福临乡小学所在地），隶属巴中县茶坝区管辖。乡苏维埃组成人员是：

主席林廷贵（福临场街道人）， 土地委员唐开连（福临

场街道人)，粮食委员万兴邦（福临场街道人，担挑力夫），内务委员 罗国模，文化教育委员兼打粮队长熊金华（福临场街道人，手工业工人），笔书 王善益（福临场街道人），游击队长 刘大朝（福临场街道人），副队长 郑茂明（福临场街道人），战斗连连长刘永祥（巴中群乐人）。

全乡建立了四个村苏维埃。各村主席是：

周家湾（现金堂村）苏维埃主席伍常贵，狮滩溪（现建华村）苏维埃主席张贤德，猫儿嘴（现插旗村）苏维埃主席蒋顺提，宝瓶观（现保平村）苏维埃主席顾朝吉。

乡村苏维埃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当时严重的问题是缺粮、缺钱。苏维埃便组织群众下乡打粮。主要办法是打击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钱、粮集中到乡苏维埃作为革命活动之用。乡苏维埃在红军特务连赵连长指挥下，在场上和附近村组织了贫苦农民积极分子百余人，作为游击队，一部分人下乡打粮，一部分人在红军苟班长带领下，每天早晨和上午在福临场禹王宫大坝子下操、学刺杀、瞄准。并负责在福临场磬子包、晒金石等地站岗放哨。打粮队曾在三叉河（现巴中群乐乡）、五郎坪（现巴中群乐乡境）、插旗寨（现福临乡金堂村）等地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物。苏维埃设有仓库，粮食、油肉、衣物、银元、铜钱分别存放入库，用牛尾巴锁锁门。仓库保管员由乡主席林廷贵兼任。

乡苏维埃建立后，重视恢复工商业。红军赵连长和乡苏维埃干部在

福临场街道召开居民户会议，宣传在场镇恢复原有工商业活动。按原来习惯定为每旬逢二、五、八日为福临场当场日。当场天允许农民上街将粮、菜、肉、布匹（自己织的土布）等各种土特产和外地商品贩运进场交易。红军又在街上开办工农饭馆（现福临场居民李跃清家），工农招待所（现福临场居民徐廷周家），农民龙启福当招待员，负责安排上级来乡检查工作的人员的住宿、生活。当时严重的问题是缺盐卖（原来吃盐是商人从南部背湾寺背回来的）。一天游击队在五郎坪（巴中群乐乡五郎村）哨口查出有两个“背老二”（运盐的人）夜宿五郎坪客栈。乡苏维埃文化委员熊金华立即前往了解情况，确是事实。便向这两个“背老二”宣传红军的工商业政策，动员这两个盐商到福临场卖盐，保证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失。盐商提出，买盐一律用银元、铜元，不用红军布票。理由是到南部买盐，那里是白军控制区，只能用银元、铜元。红军杨营长同意这两个卖盐人的意见，写了一张条子贴起，用银元、铜板买盐。两个“背老二”卖完了盐，收拾了钱物，又在乡苏维埃领了通行证便回家去了。这个消息一传开，以后卖盐的“背老二”便陆续来福临场卖盐了。

乡苏维埃还召开过土地会议，讨论农民分田问题。红军赵连长和乡苏维埃干部一起召开土地会议，决定将土豪劣绅（多数逃到南部县境去了）的田地没收过来分给农民耕种，由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唐开连负责分户插杆落实。土地会议后，全乡开展了宣传，有的村行动快分了一部分田地，有的村没有行动，不久便停止了。